

价值引领与日语语言习得的非对称性关系研究

申冬梅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课程思政在高校外语教学中逐步铺开之后，价值引领与语言习得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已有讨论多半从应然出发，对二者实际互动形态的考察并不多。本文以“非对称性关系”为分析概念，从时间、效果和主体三个维度界定价值引领与日语语言习得之间的错位与张力，并借用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和语言意识形态理论，搭起了一个“认知—动机—文化”的三层解释框架。方法论为混合方式，以问卷加语言测试为主、半结构化访谈为辅，考察价值引领感知与日语能力发展之间的关联模式及中介路径。初步分析表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促进关系，更可能呈现“短期干扰—长期增益”的时间模式，以及接受性与产出性技能之间落差明显的分化走向。将“非对称性”这个视角引进来，将课程思政研究从要不要做的讨论，向做了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的方向推进一步。

【关键词】价值引领；日语语言习得；非对称性关系

【收稿日期】2026 年 7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8 月 11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83

A study on the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guidance and Japa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Dongmei Shen

Guangzhou Cit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t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actually exists between value guidance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become unavoidable. Most existing discussions have proceeded from a prescriptive perspective, while empirical examinations of their actual interaction patterns remain scarce. This paper adopts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as its analytical concept, defining the misalignment and tension between value guidance and Japa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along three dimensions—temporal, effectual, and subjective. Drawing on sociocultural theory, 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and language ideology theory, it constructs a three-tiered explanatory framework encompassing cognition, motivation, and culture. Methodologically, the study employs a mixed-methods design, primarily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 supplemented b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amine the patterns of association and mediating pathways between perceptions of value guidance and Japanese proficiency development. Preliminar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one of simple facilitation; rather, it more likely exhibits a temporal pattern of “short-term interference and long-term gains,” along with a clear divergence between receptive and productive skills. By introducing the perspective of “asymmetry,” this study moves the research o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beyo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implement” toward an inquiry into “what effects it actually produces.”

【Keywords】 Value guidance; Japa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引言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之后，课程思政从政策理念变成了教学实践。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出台，把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框架正式固定下来，外语学科也随之掀起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热潮。文秋芳较早地提

出了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框架与实施路径^[1]，王晓军则对已有研究做了系统梳理^[2]。日语教育领域教材编写者开始嵌入中国文化元素，教师上课时引入中日比较的视角，学期考核里增加了反思性写作。这些做法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个问题没怎么被追问过，即这些做法对学生的日语能力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一线教师的困惑其实不少。讲中国故事花的时间会不会挤占语法和词汇的进度、反复灌输价值观会不会让学生反感、影响课堂参与,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二语习得涉及注意分配、记忆编码、自动化加工等一系列认知过程^[3]。秦晓晴对中国大学生外语学习动机做过大规模调查,明确指出了一个事实:学习动机是一套多维度、动态变化的东西,外部干预的效果受学习者个体差异的调节非常明显^[4]。那么,价值引领作为外部干预的一种,它跟语言习得之间到底走的是什么逻辑?

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让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和动机结构本身就处在一种张力里。一个学生选日语,可能是喜欢日本动漫,可能是想将来做对日贸易。高一虹提过“生产性双语学习”这个概念^[5],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相互促进,学习者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但在日语学习语境中能不能成立,需要打个问号。当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倡导碰上学习者个人的二语自我意象,反应可能截然不同:有人觉得是使命,有人觉得是负担。这个差异,即可用“非对称性”概念来捕捉和解释。

1 非对称性与其三个维度

“非对称性”(asymmetry)这个词来自数学和物理学,本意是指两个对象之间不构成镜像对应关系。引入社会科学之后,多半用来描述变量之间那种非均衡、非线性的作用模式。放到本文的语境里,指的是价值引领作为一种教育干预,内容输入跟语言习得效果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投入—产出”对应,二者在时间节奏、技能分布和个体差异上可能出现明显的错位、滞后,甚至反向作用。戴炜栋在讨论中国外语教育体系构建的时候提出外语教学改革必须充分考虑中国语境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套西方理论^[6]。课程思政是中国语境下的特有实践,它的效果复杂性同样需要从中国学习者的实际出发来分析。

1.1 时间上的错位

最直观的非对称性,就是时间差。当思政内容作为附加信息进入日语输入时,学生的注意力得同时处理语言形式(假名、语法结构、句型)和价值内容(文化观念、立场判断),认知负荷几乎必然会增加。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7],两个任务同时上,效率就得降。所以短期内,价值引领可能拖慢阅读速度和口语表达的自动化。但事情还有另一面,经过一段适应期之后,如果学习者慢慢把价值内容内化成了自己的认知框架,它反而可能增强学习的目的感和持续性,一个找到了“为什么学”的学生,比一个只管机械背单词的学生更走得远。中介工具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

的,得经历一个从外部调节到内部自我调节的转化过程。束定芳在讨论外语教学改革的时候也说过,教学改革的效果往往有“滞后效应”,不能拿短期指标来论成败^[8]。

1.2 技能层面的分化

非对称性在不同技能维度上表现不尽相同。听力和阅读属于接受性技能,学习者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双重加工,可以先理解语言再消化价值观,或者反过来。所以带思政内容的阅读材料不见得比纯语言材料更难,有时候反而因为内容熟悉而降低了理解门槛。文秋芳在搭“产出导向法”理论框架的时候就指出过,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学习对认知资源的需求存在本质差异,输入环节更容易做到“以内容驱动语言学习”^[9]。但换到口语和写作这种产出性技能,情况就不同了。输出任务对即时语言编码的要求高,如果还得同时掂量立场对不对、表达得不得体,流利度和准确性都可能打折扣。基于规则的分析性系统需要更多的注意力,当它被价值判断占用的时候,基于范例的自动化输出就受到了挤压。语用层面倒可能走出另一条路,价值引领对跨文化语用意识的培养,说不定比语法教学来得更有效,因为它直接触碰到了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语境。

1.3 个体差异的影响

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构成了第三种非对称性。同样的思政内容,放到不同的学生身上,反应可能天差地别。这跟几个因素有关:先前的文化知识结构、二语学习动机的类型、以及对自己二语使用者这个身份的想象。高一虹等对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外语学习者的动机类型呈现“工具型”与“文化型”并存的格局,而且两种动机的权重是因人而异的^[10]。如果学习者把能以日语传播中国文化内化成了理想自我的一部分,那价值引领就是助力,可如果学习者学日语的初衷是想融入日本社会或追日本偶像,思政内容跟个人动机之间的冲突就会产生抵触。这说明价值引领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不是一个统一的“剂量—反应”关系,不同的人走的是不同的路。

2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要解释上面说的这些非对称性现象,靠单一理论是撑不住的。本文尝试把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和语言意识形态理论编织在一起,搭一个从微观认知到宏观文化的多层分析框架。

2.1 中介工具的调节逻辑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类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靠的是文化中介工具——语言、符号、概念系统——的内

化。到了二语习得领域, Lantolf 和 Thorne 把这个观点进一步扩展: 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 学习者不光获得语言技能, 也在吸收和内化跟语言捆绑在一起的文化价值观^[10]。从这个角度说, 课程思政本质上就是在日语学习情境里引入了一种新的符号性中介工具。这个工具能不能起作用, 得看两个条件: 一是学习者能不能理解并接受它传递的内容——可及性; 二是学习者能不能在语言实践中把它用起来——可用性。两个条件缺一个, 中介工具就可能悬置在学习者的认知系统之外, 甚至引起反感, 也就是所谓的“逆调节”效应。文秋芳在论述外语课程思政实施框架的时候也反复强调, 思政元素的融入必须“润物无声”, 生硬灌输不但达不到育人效果, 还可能损害专业学习本身的质量。

2.2 动机的增强与抑制

二语动机分为三个部分: 理想二语自我——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二语使用者; 应该二语自我——我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来满足外部期望; 以及二语学习经验——课堂上的真实感受。价值引领对这三个部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可能给理想二语自我加一个文化传播者的维度, 让学习者在用日语找工作之外, 看到另一种可能性。但也可能把应该二语自我给强化了, 即我必须学好日语, 因为国家需要。这种外部驱动的动机虽然有短期效果, 长期来看却不如内化的理想自我来得稳定。在中国大学生外语学习动机中, 内在兴趣动机的预测力远远高于外部要求动机。日语学习者群体的异质性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复杂效应, 有人是因为喜欢日本文化来的, 有人是高考调剂过来的, 有人是冲着就业来的。对第一类人, 价值引领跟原有动机之间可能形成张力, 对后两类人, 它反而可能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意义, 让原本不得不学的学生找到了值得学的理由。

从动机理论再往下挖一层, 价值引领对二语学习经验这个维度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思政内容被嵌入课堂活动之后, 它直接改变的是学习者的即时学习体验。教材选文变了, 讨论话题变了, 写作任务的方向也变了。这种改变如果处理巧妙, 能让课堂变得更有深度和温度; 如果处理生硬, 就可能让学习者觉得课堂变了, 不再是他们期待中的日语学习空间。二语学习经验是动机系统里最直接、最感性的部分, 受课堂环境的即时影响也最大。所以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到底是“融入”还是“植入”, 是“引导”还是“灌输”, 可能比思政内容本身更深刻地影响着学习者的动机走向。

2.3 意识形态的深层张力

语言意识形态理论提醒我们语言学习从来不是价

值中立的活动。每种语言教学背后都有一套关于什么是好的语言、为什么学这门外语、学了之后为谁服务的文化信念。日语学习的情境尤其微妙, 学习者一方面通过语言接触日本文化, 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中国立场和文化自信。这两种意识形态——国家主导的价值引领, 加上目标语文化带来的潜移默化——在学习者的认知空间里构成了一个张力场。非对称性关系的深层根源, 可能就在这儿。价值引领试图在日语学习过程中植入中国主体性, 但日语学习本身又不可避免地让学习者接触到日本的价值观念, 两者之间的摩擦和协商, 最终具体化为语言习得效果上的各种不均衡。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设计, 量化为主、质性为辅。量化部分通过横断调查, 收集价值引领感知与语言能力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数据; 质性部分通过半结构化访谈, 了解学习者对思政内容融入日语课堂的真实体验。探讨在基础日语学习过程中, 价值引领与语言习得效果之间呈现出怎样的非对称性关系, 其形成机制又是什么。两种方法互补: 量化数据告诉我们存在什么关系, 访谈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3.2 研究对象

拟选取国内高校日语专业或大学日语课程的学习者, 重点聚焦基础阶段(学习时长1—2年)。这一阶段的学生语言能力正处在快速上升期, 文化认同和动机结构也还没定型, 对价值引领的敏感度相对较高。样本量方面, 问卷调查不少于200份有效样本; 如果采用准实验设计,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不少于50人。调查学习者对价值引领内容的感知程度与词汇习得率、语法准确率、阅读流畅度等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方向如何等问题。取样时要兼顾院校类型以及日语水平层次, 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3.3 测量工具

围绕核心变量, 需要开发三套工具。首先是价值引领暴露与感知量表, 测量学习者接触思政内容的频率、感知强度及主观接受度, 条目编制参照文秋芳和张虹、文秋芳等既有研究的测量维度, 经过专家评审和预测试。第二套是语言能力测试, 可采用JLPT(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真题的选定部分或自编分项测试, 涵盖词汇、语法、阅读和听力。最后是中介变量量表, 包括二语动机量表, 同时参考了秦晓晴对中国大学生动机结构的本土化研究成果、文化认同量表。所有量表在使用前都需要检验信度(Cronbach's α)和效度

(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

3.4 数据分析

量化数据用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和 AMOS 来处理, 描述性统计呈现样本特征, 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高/低价值引领暴露组在语言能力指标上的差异, Pearson 相关和多元回归探索变量间的关联模式,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质性数据采用主题分析法, 对访谈文本进行六级编码, 熟悉数据、生成初始编码、搜索主题、审查主题、定义和命名主题、撰写报告, 提炼非对称性体验的关键主题和典型模式。

4 预期发现与学术贡献

基于理论推演和已有研究, 本文预期价值引领与日语语言习得之间可能呈现三种非对称形态。首先是“短期干扰—长期增益”的时间模式。初期认知负荷增加导致阅读速度和口语流利度下降, 但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 文化自觉的增强可能转化为持续的学习动力。其次是接受性与产出性技能的分化, 听、读等输入型任务因为有更多加工时间, 受益于思政内容的可能性更大, 说、写等输出型任务则可能因为内容复杂度上升而受到抑制, 呼应了文秋芳在“产出导向法”中对输入输出功能差异的论述。第三种是动机类型的调节效应, 融合型或文化传播型动机的学习者更可能从价值引领中获益, 纯工具型动机者则可能产生抵触, 这跟高一虹等关于中国学习者动机类型差异化的发现是吻合的^[11]。

学术贡献方面, 本文第一次把“非对称性”概念引入到课程思政与二语习得的交叉地带, 为理解二者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促进论和无用论的第三种视角。在实证层面, 本文试图推动课程思政研究从理念讨论走向效果检验, 弥补当前“应然多、实然少”的不足, 该领域亟需“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来支撑理论建构。在政策层面, 研究结论可能带来的启示是价值引领不是越多越好, 也不是越早越好, 需要根据学习阶段、技能类型和个体差异来做精细化设计, 真正实现文秋芳指出的“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5 结论

本文围绕“非对称性关系”这一概念, 对价值引领与日语语言习得的互动形态做了一个理论层面的探讨。概念层面, 从时间、效果和主体三个维度界定了非对称性的内涵。理论层面, 整合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和语言意识形态理论, 搭了一个多层分析框架。方法层面, 给出了混合研究设计的具体方案。本文的核心论点是: 价值引领与语言习得之间不是简单的促进关系, 而是充满错位、张力和个体差异的复杂互动, 认识

到这一点, 是课程思政从粗放推进走向精准实施的前提。

未来研究可以沿着以下几个方向继续进行。一是开发标准化的“价值引领—语言习得”测量工具, 把非对称性从概念层面推到操作化层面, 使其具备可重复检验的实证基础。二是做跨语种的比较研究, 日语、英语、俄语等不同语种的学习者, 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的互动模式可能有显著差异, 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非对称性关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三是引入纵向追踪设计, 跟踪同一批学习者从基础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轨迹, 来捕捉价值引领效应的“短期—长期”转化过程。四是关注教师变量, 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水平和实施方式, 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 影响价值引领的最终效果。只有把学习者、教师、教学内容三者放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里, 才能对非对称性关系形成更完整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文秋芳.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 中国外语, 2021(02): 47-52.
- [2] 王晓军. 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研究回顾与展望. 当代外语研究, 2024(04): 40-51.
- [3] Ellis, Rod.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4] 秦晓晴. 中国大学生外语学习动机研究.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3 月.
- [5] 高一虹. “1+1>2” 外语学习模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 [6] 戴炜栋.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05), 322-327.
- [7] Sweller, John.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Cognitive Science, 1988.12(2), 257-285.
- [8] 束定芳. 外语教学改革: 问题与对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6 月.
- [9] 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47(4), 547-558.
- [10] Lantolf, James.P., & Thorne, Steven.L.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年 2 月.
- [11] 高一虹, 赵媛, 程英, 周燕. 中国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 现代外语, 2003.(01), 28-38.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